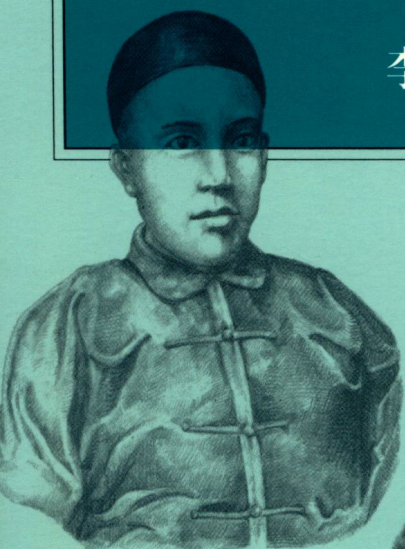


動盪時代的知識份子

李良玉著



D691.71
20102

動盪時代的知識份子

李良玉 著



台北 南天書局 出版

動盪時代的知識份子 / 李良玉著. -- 初版. -- 臺

北市：南天，1996〔民85〕

面；公分. -- (中國社會經濟史；2)

ISBN 957-638-373-0 (平裝)

1. 學術思想—中國—晚清(1840—1911)

2. 學術思想—中國—現代(1900—)

3. 知識份子—中國

112.7

85005967

本書原1990年出版於浙江人民出版社，經合法授權本公司出版發行

動盪時代的知識份子

定價300元

著者 李良玉

發行人 魏德文

發行所 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地址 台北市羅斯福路3段283巷14弄14號

電話 (02)362-0190 (代表號)

電傳 (02)362-3834

郵撥 01080538 (南天書局帳戶)

登記號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1436號

國際書號 ISBN 957-638-373-0

版次 一九九六年八月初版一刷

印刷者 國順印刷有限公司

廠址 板橋市中正路216巷2弄13號

著作權所有·翻印必究

編◎序

歷史學是一門古老而又常新的學科，有其自身的規範和功能；與此相觀照，以再現過去為本旨的社會史研究的勃興，體現了當代歷史學演進的內在邏輯。

就歷史認識的整個過程而言，“在第一條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發為抽象的規定；在第二條道路上，抽象的規定在思維行程中導致具體的再現”。由傳統史學脫胎而出的社會史研究，正是以其整體史觀的新姿，強調對歷史“完整的表象”的研究。它既涵蓋傳統史學的研究領域，更關注社會結構——功能及其運行機制靜態和動態的研究，從而進行人類歷史景觀的模擬復原，使之客觀準確地成為檢測現代社會的參照。

時下，中國社會史研究尚處在摸索起步階段，如何展開中國社會史研究，尚有賴於學界同仁的合作努力。為此，我們組織了這套《中國社會史叢書》，希冀其能起到拋磚引玉之效。顧名思義，這套叢書是以整個中國社會史為研究對象的，它涉及社會結構、社會階層、社會團體、社會思潮，社會問題，社會生活等方面。它對我們今日認識國情，推進社會主義的改革事業將大有助益。

我們深知，僅僅通過這套叢書，決不可能完成中國社會史研究的任務，即使所出的著作能否達到社會史學科所規定的要求，也還

有待專家的評判。故此，我們誠懇地期望讀者和學者們給予批評指導。

《中國社會史叢書》編委會

目 錄

第一章 維新派知識份子與戊戌思潮	1
第 1 節 晚清科舉知識份子	1
1. 時代的震蕩	1
2. 科舉的奴役	3
3. 士大夫的傳統意識	7
第 2 節 激進知識份子的出現	12
1. 「甲午」刺激	12
2. 新思想的閃光	14
3. 舊傳統	17
4. 日本模式	22
第 3 節 戊戌思潮的興起和衰落	25
1. 戊戌思潮的興起	25
2. 新舊思潮的衝突	30
3. 鮮血染紅了維新	36
第 4 節 傳統意識的嬗變	37
1. 日本的陶冶	37
2. 民族主義與民主意識	41
3. 道統觀的淡化	45
4. 國民性批判	50

5. 進一步退一步	55
第二章 革命派知識份子與革命思潮	59
第1節 新興知識階層的誕生	59
1. 新式高等學校的出現	59
2. 第一次留學高潮的興起	64
第2節 維新思潮向反清思潮的過渡	68
1. 革命沒有超前	68
2. 保皇與反清的分野	73
3. 留學生的激進化	79
第3節 反清與共和	83
1. 反清思潮的高漲	83
2. 歐美模式	90
3. 社會與思想的追溯	95
第三章 癡狂革命者與無政府主義思潮	105
第1節 無政府主義思潮的興起	105
1. 反清思想的刺激	105
2. 與日本左派的關係	108
3. 癡狂的革命者	111
4. 追求與放任	113
第2節 無政府主義流入國內	117
1. 師復主義	117
2. 三無主義	121
第3節 新村變奏曲	127
1. 無政府新村與新生活	127
2. 新村主義與互助工讀	131

3. 未來之夢的終結	135
第四章 五四前後的知識份子與社會思潮	143
第1節 新興知識份子隊伍的壯大	143
1. 教育事業的發展	143
2. 第二次留學高潮	151
第2節 民主科學思潮的興起	158
1. 國粹主義與帝制復辟	158
2. 專制立憲論批判	162
3. 歷史的反思	167
4. 全盤反傳統主義	172
第3節 民主科學思潮	178
1. 中等知識階層的崛起	178
2. 俄國模式	186
第4節 多元思潮的匯合與衝突	193
1. 多元思潮的匯合	193
2. 多元思潮的衝突	201
第五章 五四思潮的演化與新中國	211
第1節 民主主義向法西斯主義的蛻變	211
1. 畸形的民主觀	211
2. 領袖至上與政府萬能	219
3. 重建道統的過程	227
第2節 冒牌的傳統意識和三民主義	236
1. 日本近代軍國主義思潮	236
2. 漢奸賣國主義的社會基礎	242
3. 漢奸理論的透視	246

viii		
第3節	近代知識份子的抉擇	254
1.	馬克思主義的傳入	254
2.	第三國際和俄國的影響	259
3.	延安模式的勝利	263
4.	民主主義仍然是武器	265

第一章

維新派知識份子與戊戌思潮

第一節 晚清科舉知識份子

一、時代的震蕩

一百四十多年前，廣東海面上突然響起了美國軍艦的炮聲。它劃破沉寂的中國長空，驚動了北京莊嚴肅的紫禁城。從此，天朝上國的雍容華貴，慢慢地零落以盡。這一段歷史，那樣地令人難堪，它刺激和折磨中國人的自尊心，至少有一百年之久。

如果我們暫時撇開西方國家對中國進行殖民掠奪的性質，那麼，近代中外衝突的物質條件對比，便是先進的資本主義工業對落後的傳統農業的征服。從這個視角上可以看到，近代化這個歷史命題，是通過侵略者的槍林彈雨所啓示的。先進的中國人對於這個啓發，似乎頗得靈感。從魏源的“師夷長技”到轟轟烈烈的洋務運動，不管他們思想上有多少歧異，從物質層面上學習西方是大體一致的。然而，近代中外的不同歷史條件，還包括社會制度的優劣這樣一個文化意義上最重要的內容。應當承認，中外衝突的結局，顯示了資本主義民主制對封建君主制的衝擊。這就決定了中國近代化的實質，不僅是資本主義工業化，而且寓寄著民主化的深刻要求。

也就是說，中國人必須實現從物質生活到精神世界、從社會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的全盤轉換。這是一個嶄新的課題。

實際上，中國的厄運，並不能僅僅看成是近代時空範圍內發生的悲劇，通過西方政治文化的比較，可以從更深的層次上揭示這場悲劇的歷史原因。西方國家的強大，以人的自由為起點。從意大利文藝復興開始的人文主義思潮，向中世紀宗教神學發生挑戰，培育了近代資本主義的新精神，新思想和新道德。十六世紀中葉哥白尼《天體運行論》的發表，吹響了科學起義的號角，對神學的審判由文學藝術的殿堂移到了科學講壇。跟著便是資產階級革命，封建社會土崩瓦解，科學大昌魔術般地使社會經濟日新月異，歷史以目不暇接的速度飛快前進。而這一切，中國人並不知道。當他們以禮義之邦目空一切的時候，古文明的危機早已醞釀成熟。這突出地表現在宋明理學關於人與倫理關係的本末倒置。宋明理學把傳統文化中的封建倫理加以強化，向根本漠視、否定人的價值和個性的極端方向演繹，從而赤裸裸地提出了諸如“人心莫不有知，惟蔽於人慾，則亡天德”、“存天理、滅人慾”那樣滅絕人性的口號。這真是儒學的瘋狂，本質上它又是中國封建制度走入窮途末路的徵兆。中國封建制度在唐之前，其特點是地方權利向中央集權過渡，唐以後則逐步實現了完全向皇帝個人集中。封建制度的極端專制化，是以士大夫階層一切批判的勇氣、一切個性的要求，一切異己的政治行為徹底放棄作為條件的。不過，這還不是事情的全部。到了清代，滿清統治集團不僅繼承了宋明理學和傳統封建制度的專制主義精神，更以異族入主中原，千方百計地消滅漢族知識份子的民族意識，這就使歷代相沿的思想統治，更打上文字獄的血腥標記而猙獰可怖，知識份子如果還能稱作知識階層，不過以學者的繁瑣考據才

得以苟延殘喘。龔自珍這樣泣血錐心地控訴了統治集團對知識份子人格的暴虐行徑：“僂其能憂心，能憤心，能思慮心，能有廉恥心，能無渣渣心”。整個清代中葉都是一片陰霾晦澀、枯燥無味的氣氛。因此，如果要追溯中國落後的歷史過程，恐怕要從西方人文主義思潮和宋明理學開始。人文主義思潮用人學反對神學，用縱慾主義對抗宗教禁慾主義，用人權反對君權，從而開拓了人的自由、生產力的自由和社會制度變革的輝煌時代。宋明理學則截然相反，用儒教禁錮思想，用禁慾主義消滅人慾，用君權摧殘人權，從而大大加劇了中世紀的黑暗。思想、慾望、人權，本質上都是人的價值的體現，如果把中西文化的區別歸結到對人的態度，那麼，西方文化發展人的個性，中國文化讚美人的共性；西方文化注重人的外向性，中國文化提倡人的內向性；西方文化追求人的權利，中國文化強調人的義務。這種巨大反差，決定了中國人接受西方文化的影響，比屈服於侵略者的槍炮所引起社會震顛，還要強烈得多。

二、科舉的奴役

在談到中西文化的時候，應當指出，從近代思想史的角度看，在1898年戊戌變法以前，中國知識份子中當然不乏關心、了解和主張學習西方文化的真知灼見，只不過它們大大缺乏社會思潮所擁有的廣闊性和豐富思辨，其實際影響是極其有限的。儘管近代社會發生了急劇傾斜，但是，從整體上看，知識份子對中西文化的衝擊和滲透，似乎並未十分及時和敏感地有所認識和感應，至少在1894年甲午戰爭以前，這個社會階層沒有騷動不安的跡象。這是什麼原因？第一，由於中國知識份子對西方文化的心理隔膜。中國文化歷來被認為是天下最優秀的文化，他們對儒家典籍以外的東西是不屑

一顧的。下面這個事實可以證明這一點：在1898年以前，中國共翻譯了大約561種西方書籍，從出版地區分析，上海出版434種，占77.4%，從譯者分析，約有360多種是由外國傳教士主持或他們參與譯述的，占65.1%。中國知識份子不懂外文，也不需要知道外國的事情。當時傳教士譯書，大多自己口譯，由別人用中文記錄下來。第二，由於中國知識份子對科學的執着追求。科學是中國傳統的人才選拔制度和教育制度。清代科舉制大致沿襲明制，它分為三個層次：（一）秀才。凡讀書人必須經過一定考試選拔，錄取進入縣學、州學或府學，才能得到秀才資格，這是科舉的初級功名。考秀才的考試稱爲童子試，參試者稱儒童或童生，錄取入學後稱爲生員，又稱庠生，秀才是俗稱。（二）舉人。由秀才經過鄉試取得舉人資格是科舉中關鍵的一步。清代鄉試三年一次，逢子、午、卯、酉年開科，因在8月舉行，故又稱秋闈。舉人是中級功名，大約有50%的舉人可望得到一官半職，躋身官僚階層。（三）進士。由舉人經過會試取得進士資格是決定命運的一步。會試三年一次，逢辰、戌、丑、未年開科，因由禮部主持，稱爲禮闈，又因在二月舉行，又稱爲春闈。

科舉制度不適應中國近代化的歷史要求，這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科舉名額限制造成了知識份子出路狹窄。科舉的三個層次，秀才、舉人和進士都有名額限制。秀才的名額一般是大府20名，大州縣15名。舉人名額以省爲單位，一般大省80—90名，中等省60—70名，小省30—40名，每科全國約錄取1,200多名，考取進士的更少。從清順治三年到光緒三十年的258年中，共開112科，取進士26,000餘名。有人統計，每屆投考者總有6,000—7,000之衆，錄取率約爲3%。這就是說，大約有97%的舉人是不可能取得

進士功名的。其次，它不可能為社會提供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新型知識人才。康有為敏銳地看到了這一點，他指出：“今日四海棣通，列強互競，歐美之新政新法新學新器日出曹奏，歐人乃持其汽船，鐵路，以貫通大地，囊括宙合，觸之者靡，逆之者碎，揉而用之，則與之化同，乃能保全”⁽¹⁾。科學制度反其道而行之，它把中國人重義輕利的傳統倫理觀念加以惡性發展，“中國文士，專上制藝，即本國之風土人情、兵刑錢穀等事，亦非素習，功令所在，士之工於此者得第，不工於此者即不得第，雖豪傑之士，亦不得以有用之心力，消磨無用之時文。即字字精工，句句純熟，試問能以之義安國家乎？不能也。能以之懷柔遠人乎？不能也。一旦業成而仕，則又盡棄其所學。嗚乎！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天下之無謂，至斯極矣”⁽²⁾。它造成了社會風氣頹壞，更直接決定了清朝政府決策部門的昏庸，“有以外部之要，而言澳門在星加坡之外者；若親貴極藩，問安南在何處？與廣西近否？則固然矣。是以割混同江、精奇里江、烏蘇里江六千里土地與俄……而中朝若不知之”⁽³⁾。

科學制度是中國知識份子接受西方文化的嚴重障礙。這個制度把社會各階層的人才吸收進入政權，造成人才流向的單一化，知識份子除了徹底依附於這個政權別無他途。西元1652年各地學宮建立的臥碑中說：“朝廷設立學校，選取生員，免其丁糧，厚以廩膳，設學院、學道、學官以教之，各衙門官以禮相待，全要養成賢

1 〈進呈日本變政考序〉，《戊戌變法》（三），頁3。

2 鄭觀應，〈盛世危言〉，《戊戌變法》（一），頁50。

3 〈中國除害議〉，《戊戌變法》（三），頁123。

才，以供朝廷之用”⁽⁴⁾。康熙九年禮部題准：“生員如果犯事情重，地方官先報學政，俟黜革後治以應得之罪，若詞訟小事，發學責懲，不得視同齊民，一律撲責”⁽⁵⁾。可見秀才已經能夠享受到一定的政治、經濟特權。清政府規定，正規科甲出身為正途，餘為異途，“其由異途出身者，漢人非經保舉，漢軍非經考試，不得授京官及正印官，所以別流品、嚴登進”⁽⁶⁾。有人統計了清代總督、巡撫一高級官吏2,748人，其中有1,031人出身進士；781名侍郎中，約450多人出身進士。通過讀書考試可以獲得高官厚祿，這在官本位意識濃厚的中國人中，有著巨大的誘惑力。對於那些除了這條道路之外，根本沒有其他可能來改變自己社會地位的人們來說，科舉更是唯一的指望。有人統計，明清兩代的進士，平均有42.9%出身於從未有過功名的家庭，清代約有二分之一以上的生員，出身寒微。有人統計了清代112科會試產生的112名狀元的家庭出身，查實有26人出身於父祖兩代既無功名又無官職的清寒之家。科舉制度保證了中國社會的政治文化一體化，知識份子沒有自己的獨立人格，不能形成與統治者不同的價值觀，這就決定了近代知識份子心安理得地按照固有的生活方式，選擇自己的人生道路。

功名意識、經學意識和綱常意識，是科舉制度下知識份子的群體意識，代表著他們的價值體系。在這個價值體系沒有被動搖之前，他們不可能認識近代民主化的歷史任務。

4 〈事例〉，卷389，《禮部·學校·訓士規條》。

5 同上書，卷392，《優恤諸生》條下。

6 《清史稿·選舉制》。

三、士大夫的傳統意識

科學知識份子以讀書和參加科學考試為獲得功名利祿的目的和手段，科學制度必然使他們培養成了不同於社會其他階層——例如農、工、商，比較獨特和穩定的心理素質和思想意識。反過來，通過他們的家庭、親友、社會活動等等，這種思想意識必然又影響其他階層，成為支配社會的倫理道德，甚至風俗習慣的規範力量。科學知識份子的思想意識主要表現為功名意識、經學意識和封建綱常意識。

功名意識是科學知識份子最普遍的思想意識。唐代高蟾詩：“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束倚雲栽。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東風怨未開”。作者對別人登科後平步青雲的描寫，反襯了自己失落的心態。宋代蘇軾詞：“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流露了士大夫經邦濟世的政治抱負無法實現的憤悶。封建時代的啓蒙讀物中，諸如“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少小須勤學，文章可立身，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等等，不獨在孩童時期就給讀書人指明了奮鬥方向，同時又是科學時代的普遍價值觀念。明末小說《三刻拍案驚奇》中，有一個以靠替富家子弟找人冒名頂替作槍手為生的惡棍，一個秀才的價格為300兩銀子，其辦法是：“他自去尋有才、有膽、不怕事秀才，用這富家子弟名字進試，180兩歸做文字的，120兩歸他。複試時也還是這個人，到進學，卻是富家子弟出來，是一個字不做，已是一個秀才了”⁽⁷⁾《儒林外史》所描述范進中舉前後人們對其態度的變

7 《三刻拍案驚奇》，頁294。

化，活脫脫地刻劃了以功名決定貴賤的世風。它驅使知識份子皓首窮經，至死不移地追之求之。近代思想家薛福成指出，無錫一帶有人“年至斑白，猶混跡於童子軍中者”⁽⁸⁾。據記載，清乾隆四十九年會試，各省舉人中有九十歲者一名，八十多歲者二十名，七十多歲者五名。康有為說：“竊計中國人多，最重科第，退以榮於鄉，進以仕於朝，其額之窄，其得至難也，諸生有視科第得失為性命者”⁽⁹⁾。周恩來年輕時曾記載一考生，因屢試不第，氣疾而亡，臨終前為自己寫下一副挽聯，說：“疾自何成，都為二字功名，戕我身心戕我命；死奚足惜，捨不得兩父母，看兒生長看兒亡”。周恩來指出：“有清一代科舉之毒甚於明代。蓋文罔日緊，士非由八股以作健身之階，其道無由。故莘莘學子終日埋首斗室，唧唧吟吟，所希冀者，博得一領青衿，歸以嬌妻子耀鄉里耳”⁽¹⁰⁾。陳獨秀是戊戌時期進入科舉的，1896年考中秀才，次年還到南京參加了江南鄉試，他對當年注重功名的社會風尚作了如下惟妙惟肖而又入木三分的敘述，他說：“在那一時代的社會，科舉不僅僅是一個虛榮，實已支配了全社會一般人的實際生活，有了功名才能做大官，做大官才能發大財，發了財才能買田置地，蓋大屋，做地主，欺壓鄉民，榮宗耀祖；那時人家生了兒子，恭維他將來做剛白度（即買辦）的，還只有上海十里洋場這塊小地方，其餘普遍的吉利話，一概是進學，中舉，會進士，點狀元；婆婆看待媳婦之厚薄，全以兒子有無功名和功名的大小為標準，丈夫有功名的，公婆

8 《庸庵筆記》，卷6。

9 〈請廣譯日本書派游學折〉，《戊戌變法》（二），頁223。

10 周恩來，〈飛飛漫墨〉，《敬業學報》，期6，1917年6月。